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一)

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习研究会编印

目 录

从“八七”会议到遵义会议的若干历史情况

-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在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习研究会成立会上的报告……胡 华 (1)

对党史教学中一些问题的辅导发言

- 一九七九年七月一日在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习研究会成立会上的报告……胡 华 (37)

关于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几个问题

-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在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习研究会成立会上的报告……王 洪 (65)

关于陈独秀评价的一些问题

- 一九七九年六月三十日在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习研究会成立会上的报告……林茂生 (90)

关于瞿秋白问题的几点看法

- 一九七九年六月三十日在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习研究会成立会上的报告……刘 炼 (119)

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发展

- 一九七九年五月在山东高校党史教材讨论会上的报告……肖效钦 (136)

从“八七”会议 到遵义会议的若干历史情况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在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习
研究会成立会上的报告

胡 华

同志们：

安徽省召开党史学习研究会的成立会，这是在安徽省委、省社联、各方面领导同志关怀、重视和领导之下的一个盛会。外省的兄弟院校也有不少同志来，据说新疆还有些同志来。

这次很感谢给我们一个机会，跟同志们见面，到安徽来学习、观光，向同志们作一点汇报，和同志们交流意见。党史方面，存在着不少问题，我们对这些问题也没有作很好的研究，有些是属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当中的问题，我想今天把它串起来，作一点介绍，不是全面的，是对大家涉及到的一些问题，历史情况作一些说明，也不是从理论上作很多阐述，主要介绍历史情况，象刚才张部长讲的，我们尽量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真理，按历史的本来面目，来介绍一些情况，目的主要是供党史研究工作者参考的。

题目就是：《从“八七”会议到遵义会议的若干历史情况》。

首先从临时中央政治局谈起。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转向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从党的领导来说，首先，就是在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天左右，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改组了中央，成立了一个临时中央政治局。有些材料记载叫作五人临时中央政治局。这五人按当时写的是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根据我们调查访问和其它一些文件，实际上当时是七个人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即主持人是瞿秋白，还有蔡和森参加。七月八日左右，共产国际有一个指示，认为陈独秀不能继续领导下去，建议让陈独秀免职，委托鲍罗廷（当时是国民政府的最高顾问，共产国际的代表），在汉口召开了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这个会议没有让陈独秀参加，陈独秀在七月十天左右也知道这个情况，他提出了辞职，就让他隐蔽在汉口一家文具店里，这是我党的一个机关。由瞿秋白来代替陈独秀主持工作。因瞿秋白当时写过《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这样一些文章，批判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算是比较有系统地正面地批判过陈独秀的，所以就让瞿秋白代替陈独秀。这七个人的中央政治局也就是非常委员会。这个临时政治局主要是决定了三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当时准备在张发奎的第四军（这当中有很多党领导的力量）中，在南昌、九江一带举行起义。再一个就是决定四省秋收起义，就是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第三件事是准备召开一个中央紧急会议，就是后来的“八七”会议。因为瞿秋白在会议以后跟鲍罗廷到庐山去了，他们想讨论规划一下下一步的工作，蔡和森同志有病，所以实际上这一段紧急时期由五个人在主持，所以有些历史文件叫“五人中央政治局”。

下面谈“八一”起义。七月十二日武汉国民政府已经叛变，开始抓人。七月十三日我们临时中央就发表了一个宣言、声明，退出国民政府，痛斥汪精卫国民党中央的贩卖行为。七月十五

日接着就分共了，象宋庆龄等左派都发表了宣言，反对汪精卫的叛变。

对于“八一”起义，那时党决定由周恩来同志担任前委书记，李立三、谭平山、恽代英、彭湃、叶挺等为前委委员。在七月十六日以后先派了恽代英、李立三、高语罕（福建人，后来脱党）到九江去了解情况作准备。总理七月二十日动身，从汉口出发到九江，以后到南昌。七月底总理他们决定起义的时候，当时不是有个跟张国焘的斗争嘛！张国焘跑到九江，后来跑到南昌来阻止起义。七月二十六日或二十七日，共产国际来了一个电报。大意是：暴动有把握就进行，如果没有把握就不进行，但是，并没有一定叫停止起义。当时总理他们已经走了，临时中央开了一个会，决定派张国焘（当时已是七月底）到南昌去送信，传达中央的意见。但是并没有派他去停止南昌暴动。张国焘是主张联合当时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认为只有联合张发奎以后才能举行起义。但张发奎是靠近汪精卫的，这本来是一种幻想，这种思想也就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继续。后来他不是写了一个回忆录吗？我们有的同志可能看过叫《我的回忆》，他把这件事歪曲成为，说是共产国际叫他到南昌去停止起义，他自己好象很矛盾。这个不是事实，主要是他自己有右倾思想。所以在南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周恩来同志、恽代英同志、李立三同志他们都坚决地把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顶回去了，所以八月一日及时举行了起义。

张国焘这家伙，大约是七三年、七四年吧，当时大参考发表过一个消息，说他死了。他后来在加拿大多伦多“老人院”里。最近，我们看到香港“明报”的消息说这个人还没有死。我临来的前夕接待了加拿大的一位教授叫林达光，他们好象认为也没有死，他准备回去再调查一下，他曾派过两个学生去找过，没有找到，据说他这个人脑子已经不行了，比较糊涂了，

瘫痪了。

下面谈“八七”会议。“八七”会议是瞿秋白同志主持的，在汉口召开的一个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发表了一个“告全党党员书”。这个文件主要是当时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听了汇报后起草的（这个人是个德国人），由瞿秋白同志把它翻译出来，然后再加以修订，这样出来的。“八七”会议开了一天，因为是一个紧急会议，临时的，环境比较险恶，所以北方没有什么人来，主要是两湖的、武汉的。安徽这边也有人去。邓小平是秘书长。毛主席参加了，还有李维汉也是主持人之一，象陆定一同志这些也参加了。毛主席在会议上讲了，要用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主张实行土地革命，这些意见是很正确的，大会也这样做了。毛主席讲，过去大革命时期，我们参加到国民党里面去，我们应该去作主人，国民党象一座房子，我们进去是做主人，不是做客人。但过去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犯了右倾机会主义，也就是放弃了领导权。毛主席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在“八七”会议的“告全党党员书”里头有一个历史情况，就是讲到十万农军包围了长沙，这个问题跟事实有一些出入。去年，有些老同志，李维汉、易礼容，包括罗章龙等当事人开会回忆了一下，情况是这样的：就是五月二十一日，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当时长沙省委机关、工农组织都受到了袭击，湖南省委负责人夏曦、郭亮，跑到武汉向党中央汇报情况，请示工作。省委机关一时就被冲散了，没有人负责了。省委的柳直荀同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他跑到株州，打电话给各县的农民协会，动员农民协会的农军到长沙来会师，准备反击。浏阳中心县委书记潘心源同志，他带领着浏阳、平江的农军有几百人、几百支枪，还有梭标队，还有一些双枪队，来攻打长沙。其他许多地方农军都正在出发或者正在路上走。

这时，中央派李维汉同志到长沙来，在路上见到潘心源同志，潘心源同志问长沙情况怎么样，李维汉同志说：长沙许克祥有三千多人的武装力量，你们农民自卫军只有几百人，光你们进攻长沙，怕不行。另外他来的时候，中央（陈独秀）已经决定派谭平山他们组织一个考察团，到长沙来处理“马日事变”。于是李维汉说，你们是不是等谭平山他们来，等一等中央的指示。这样，潘心源带来的农军只跟许克祥的前哨兵打了一个前哨战就退回去了，其它的农军就没有到达长沙和包围长沙，半路上就退回去了。当时如果把各地方的农军，比如在湘东平江、浏阳这一带的集合起来，做一些准备，再过去进攻长沙，这就好了，这就是正确的。当时单纯地叫他们退回去，等中央和国民党政府来解决，这是不对的，失去了时机。但是也不是十万农军已经包围了长沙，而是准备动员农军包围长沙。这个事情的情况，潘心源同志、柳直荀同志当时都还是向中央写了报告的，中央政治通讯里有的。湖南“马日事变”以后，当时陈独秀的党中央想自上而下地采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因为当时在武汉跟汪精卫国民党政府合作，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不敢大胆发动群众，因为许克祥是唐生智部下，所以，陈独秀就找汪精卫、唐生智商量，商定以国民政府的名义派一个考察团到长沙去解决“马日事变”。考察团有谭平山（共产党员，当时是国民政府农政部长，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有最高顾问鲍罗廷，有唐生智的两个代表，因为湖南当时是唐生智的军队驻扎在那里，许克祥是何键、唐生智的部下，还有国民政府的一个代表。五个人组成一个考察团，出发到长沙去。他们到了岳阳，打电话到长沙湖南省政府联系，当时湖南省政府主席叫周澜（这个人也是唐生智的部下），周澜就回了一个电报说，请你们不要来。这个电报措辞很不礼貌，因这是国民政府的代表团，是上级，这么个措辞的电文是很不礼貌的。

谭平山看了这个电报考虑，因为周澜是唐生智的部下，肯定这是唐生智授意的，表面上他也派了两个代表到长沙去，但实际上是不欢迎的，去了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他们就只好决定退回去，谭平山、鲍罗廷就返回到武汉去。毛主席是主张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进行反击，对许克祥“马日事变”残酷地屠杀工农，实行武装反击，他向党中央请求回到湖南去，组织省委来处理这件事。陈独秀起初是同意了，也派毛主席回到湖南去，主持省委的工作。毛主席到湖南十多天，积极地组织群众，准备力量反击。但是，陈独秀不放心，不敢这么做，他又下命令把毛主席调回来。调回来后，由于这时候环境很险恶，党中央决定一些比较知名的我们党的负责人疏散，就让毛主席到四川工作去。毛主席坚持要回湖南。后来，中央改组了。改组以后的新的中央政治局，同意毛主席回到湖南去，所以在七月十五日以后派了毛主席和罗章龙两个中央委员，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回到湖南，指导湖南省委的工作，所以叫毛委员。他们到了长沙的郊区叫赵家坪这个地方。当时省委有夏明翰同志，就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那个夏明翰同志，还有易礼容同志（现在还活着，还在北京），滕代远同志、王一飞、罗学瓚、林蔚同志等。主席他们到了湖南后就改组了湖南省委，派人到湖南各地，到湘东平江、浏阳、株州、衡阳一带恢复党的组织，农民协会，恢复工作。工作一段后，中央决定召开“八七”会议，中央就通知湖南省委，派人去参加“八七”会议。研究结果，就派毛主席和当时省委书记彭公达去参加“八七”会议。毛主席参加“八七”会议后，又回到湖南，召开了“沈家大屋会议”，向湖南省委传达“八七”会议的精神，进一步改组省委，彭公达担任省委书记，决定举行湘东秋收起义。当时不是有争论吗？彭公达给中央有一个报告，有人主张在整个湖南起义，有人主张湘南起

义。主席主张湘东，在湘赣边起义比较好，所以决定在湘东举行秋收起义。同时决定里应外合，由毛主席担任前委书记，去发动湘东的平江、浏阳、安源、株州这一带的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工农武装，还有一部分正规武装力量，来进攻长沙。由罗章龙在长沙城内组织一个行动委员会，组织长沙城内的工人纠察队、农民武装，里应外合举行暴动。决定在九月中旬，到毛主席带了秋收起义的部队从平江、浏阳打到离长沙四十里的黄花市的时候，城内就起来暴动，工人纠察队，农民武装就起来暴动，里应外合配合毛主席拿下长沙，这是“沈家大屋会议”的计划。但是九月中旬，毛主席带了秋收起义的部队在平江、浏阳的战斗中受到了挫折，这我们都清楚了，毛主席认识到，这时按敌我力量对比，再攻打长沙这样的中心城市是不可能了，应该实行正确的退却，所以把失败以后的队伍，收集起来集中在文家市。到文家市毛主席决定把这个队伍带向罗霄山脉的中段，去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所以，毛主席就派人送信到长沙城里的湖南省委，就说秋收起义部队受了挫折，不能带到长沙来了，长沙城的暴动可以停止。这样，毛主席就带队伍到罗霄山脉中段，到井冈山地区去开辟农村根据地。这件事，后来瞿秋白同志主持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就是第一次“左”倾错误，把毛主席的正确的退却，去建立井冈山根据地，这么一个正确的行动批判为退却逃跑，处分了毛主席，撤销了毛主席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主席是在“八七”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

下面讲“十一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十一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上海开的。根据我们调查访问，是在上海英租界西区静安寺路一带开的。这个会议由瞿秋白、张太雷等同志主持，共产国际代表还是罗明纳兹。到会的人，有“八七”会议选出来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还有“五大”选出来的一些

中央委员，一共大概是三十四个人。十一月扩大会议，罗明纳兹作了政治报告，瞿秋白同志作了补充报告，通过了一个《中国现状和共产党任务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是有错误的，就是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不断革命”，要超越民主革命阶段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急转直下，认为中国革命的形势是不断高涨，全国都还继续有直接革命形势，党的任务就是组织城市工人的暴动和乡村农民的暴动，这就开始了第一次“左”倾路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左”的错误危害是很大的。“左”的错误往往是以革命的面貌出现，所以同样是严重地危害了革命。在组织上，当时也采取一些措施。因为，武汉失败以后，当时中央机关都不健全，中央几个委，军委、工委、农委都垮了，这时都重新恢复，建立中央的工委，由罗章龙负责，建立中央的农委，由彭湃负责，建立中央的军委，由周恩来负责。这是对的。但另外又实行了“惩办主义”，组织处理从严，把领导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失败的同志，都用“惩办主义”受了处分，把毛主席处分了，把周总理也处分了。这就不对了。

这是“十一月扩大会议”。这时全国各地都有暴动起义，有些在农村，暴动起义成功了，就是毛主席说的，上山的上山，下湖的下湖，这就对了。有些在城市敌我力量悬殊的地方，暴动就失败了，本来不适合起义的地方，犯了盲动主义错误。

十二月份，发生了“广州起义”。当时在广州，张发奎替汪精卫抢地盘，本来他的主力驻在广州，后来他跟广西军阀李济深打仗，主力撤出广州，广州城内守卫的是一个教导团，团长姓叶，就是叶剑英同志，有一千四百多人，里头有我们一个很大的党支部，二百多人的党支部，还有一些共青团员，许多是左派青年。当时城内的秘密工人赤卫队也恢复和发展了二、三千人。所以根据这个情况，认为有可能、有把握在广州起义，

把广州拿下来。起义由张太雷同志领导，叶挺、叶剑英、聂荣臻、贺昌、陈郁、邓发、周文雍这些同志，也参加领导了这次起义，成立了广州苏维埃。但是，张发奎的队伍很快回来，加上帝国主义的炮舰在珠江轰击我们的起义部队，而我们的起义军，当时没有象周总理在南昌起义那样的及时撤出广州，这个是有错误的。还在白云山跟敌人打阵地战，这样牺牲很大，造成很大的失败。最后，一小部分队伍撤了出来，到了东江流域，到了海陆丰，后来就是由徐向前同志、彭湃同志领导在海陆丰根据地斗争。这是广州起义的情况。广州起义，当时按敌我力量对比举行起义，把我们的队伍拉出来，建立一支武装力量，把监狱里的政治犯放出来，得到很多辎重、枪炮，这是胜利的。如果及时撤出来，把这个队伍撤到海陆丰，撤到粤北梅县、五华、兴宁这一带打游击那就好了。当时叶挺同志是主张这样做的，但是张太雷同志有点“城市中心”思想，结果他自己也牺牲了，这一点就没有周总理高明，周总理他们撤出来，准备在珠江建立根据地，当然后来也失败了，但广州起义没有及时撤出来，损失比较大，牺牲的同志很多。

接着就是一九二八年二月的湘南起义，是由朱德同志、陈毅同志领导“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一部分部队作为主力。朱德同志当时利用社会关系，利用范石生的社会关系补充了武器弹药，衣服，所以这支力量还是兵精粮足，武器很好的。这个主力配合湘南特委领导当地的农军举行了起义。朱德同志领导的部队叫做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毛主席带领的部队叫第一军第一师，朱德同志的部队没有“第一军”三个字。旗帜的镰刀斧头画法也不一样。宜章的农军组成第二师、郴县的农军组成了第七师，师长是邓允庭。这个暴动波及到七个县，中心是五个县，就是宜章、郴县、永兴，资兴、耒阳，加上安仁县的大部分，桂阳县的一部分，这七个县差不多有一百多万工农参加起

义。但是，当时湘南特委执行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就是烧杀政策，郴县、耒阳这些县城都破坏了。特委的很多领导人也都牺牲了，特委书记叫陈佐魁，宣传部长叫周鲁。周鲁就是跑到井冈山批评毛主席是右倾呀，烧杀太少，要把小生产搞成无产的那个人，这是很幼稚很不对的。共青团书记叫席克思也牺牲了，这是过“左”。郴县的县委书记，夏明翰的弟弟叫夏明震也牺牲了，被敌人杀掉了。敌人南北夹击，北面是何键，从长沙往南打，南边是范石生他们从南往北打，所以朱总司令的队伍就站不住脚。这时朱总司令派毛主席的弟弟毛泽覃跟毛主席联系上了，所以毛主席就带着毛泽覃来湘南接应，把朱总司令的队伍接上井冈山。四月的会师，是朱德与毛泽东的会师，不是林彪，林彪只是个连长。朱德同志的部队当时有八、九千人，正规武装差不多有二、三千人，都是枪炮很好的。他的队伍上山后大大增强了井冈山的力量。朱德同志撤出湘南后，敌人对湘南实行了残酷屠杀，耒阳县被杀了一万多人，永兴县被杀了三千多人。陶铸同志的爱人曾志就是湘南起义的，肖克同志也是。“湘南起义”出了很多老同志。毛主席与朱德总司令会师，他们也都反对瞿秋白的“左”倾政策，党内很多同志都批评“左”倾政策，“左”倾路线也就停止了。共产国际也有指示说“左”倾冒险主义是不对的。共产国际五月里有一个指示，要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要各地区各省选派一个有代表性的工农干部，党的干部来参加“六大”。一九二八年六月在莫斯科召开了“六大”。下面我们讲讲“六大”。

“六大”在莫斯科的郊区一个大农庄里召开的。那原来是俄国沙皇贵族的一个庄园，有贵族自己住的很漂亮的别墅，另外有些农民的农舍，树木很多，就在那里开的会。到会的有一百多个代表，列席的还有许多在莫斯科学习的一些同志，有些

旁听，有些当翻译，象王明这些人一九二五年出去，会说俄文就当翻译，另外还有一些兄弟党的代表参加，例如德国的台尔曼同志就参加了。参加这个大会的当时有临时中央的政治局委员，“五大”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各个地方的代表团。比较大的代表团，比如广东的代表团，由工人领袖苏兆征同志带队，北方的代表团由王仲一带队，武汉有一个代表团由项英带队（项英死在皖南，他也是工人出身），湖南代表团由罗章龙带队，安徽、江苏也有代表团。安徽的党，过去是相当有基础的。大会通知了陈独秀去参加的，但是陈独秀闹情绪发牢骚，他不去，拒绝参加会，没有参加。这个会议是由共产国际的书记布哈林指导的。今天来看布哈林对这个会议的基本思想还是正确的。具体指导这个会议的是当时共产国际东方部的负责人米夫。会上，布哈林作了政治报告，瞿秋白作了个补充报告。大会作了政治决议。大体就是这些内容。会议进行有两、三个星期，有小组讨论，大会发言；周总理作了军事报告。工运报告、农运报告都有。苏兆征、彭湃都作了报告。“六大”的决议，我们都知道，正确地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任务，党的十大纲领，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也批判了瞿秋白临时中央的“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瞿秋白认为革命还是高潮，当时就受到大会的批判，后来他也承认了错误。张国焘在大会上曾经作了长篇发言，他为自己辩护，大家就批判张国焘追随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张国焘从“三·二〇事件”、“整理党务案”，从武汉时期一直到南昌起义，犯了一系列的右倾错误。所以老同志回忆，当时布哈林就批判张国焘说，看你个子长得挺大，可是政治上你是小孩子。意思就是说你很幼稚。陈独秀的错误很明显，而你张国焘也懂英文也读了一些马列的书，可是没有很好起来抵制。“六大”经过各个代表团酝酿以后，提出了一批候选人，候选人数比当选人多一

倍，进行无记名投票选举，这还是比较符合选举法的。现在我们党提出民主选举，不能同数选举，比如选12名就提12名，你如果不同意就另外选一个，那么另外选一个能选上吗？这就是强奸民意，这个选举法是不合法的，所以现在我们的任何选举至少是多三分之一或者多一倍，不能搞同数选举。当时还是多一倍的候选名单，选出了中央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但这当中有一个倾向问题，即布哈林认为中国革命所以失败是因为知识分子领导，所以要多搞一些工人来领导。我们说工人当然成份很好，但你也不能唯成份论，如果他是工人成份，政治上也很成熟，很坚强，象林祥谦，这样一些工人当然很好。但如果政治上不成熟。甚至品质不好，那就不行。林彪、“四人帮”也搞唯成份论，一些政治上坏的，品质很坏的人，使我党吃了很大的亏，象王洪文之类的流氓。所以“六大”选了向忠发当总书记，向忠发是武汉一个划船的工人，政治上不好，品质上也不好。选得很糟糕。也选出了一些好同志，毛主席没有到会，也被选为中央委员，周总理等也担任了中央委员。“六大”以后，就开了一中全会。六届一中全会是在克里姆林宫开的，开会的那天晚上，斯大林同志接见了“六大”的中央委员，作了讲话，指出革命是在两个高潮之间，斯大林画了一个“M”，意思是两个山，你们是在两个山之间，两个高潮之间。第一个高潮已经过去，新的高潮还没有来，你们首先应该去争取群众，把工作做好，组织游击战争，准备力量，新的高潮就会到来，这对大家是很大的鼓舞。斯大林要大家好好地学习，学习马列，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六届一中全会”选了向忠发作总书记，李立三是常委、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周总理是常委兼组织部长、军事部长。当时把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留下来，担任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工作。“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以后，同志们回到各地进行传达，恢

复组织，全党精神很振奋，工作也都有较大恢复和发展，无论是红色根据地，还是白区工作都有相当的恢复。但是在“六大”以后，还存在着一些“左”的倾向，就是当时对于以城市为中心，还是以农村为中心的问题没有解决。因为当时在强大敌人占领城市的情况之下，革命退却，以农村为中心，没有解决。在白区城市工作当中，是强调斗争为中心，还是积蓄革命力量，以争取群众为中心，这个也没有很好解决。当时，还有不要统一战线，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也都搞得不对，不区分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对资方激烈斗争，对黄色工会也斗争，搞关门主义，对高级知识分子也排斥。“六大”选出的班子，向忠发，这个人文化水平不高、政治上不成熟，实际上是挂名的，李立三是中央常委、兼中央秘书长和宣传部长，所以他掌握了实权。周总理是管组织管军事的。

下面我们讲“立三”路线，即第二次“左”倾路线，那时周恩来同志到北方去巡视工作，以后又到莫斯科去开会，李立三呢，大权独揽，向忠发什么都听李立三的，这就发生了“立三”路线，就是第二次“左”倾路线。在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叫做《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开始了立三路线的错误。

“立三路线”有几个方面，一个是对形势的估计，认为革命有全国性的新高潮，而且可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直接革命形势，可以由一省数省包括中心城市的革命首先胜利，达到全国胜利，全国胜利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认为中国革命只有在世界革命总爆发中才能成功，所以说这是半托洛茨基的观点。产生这样一种胜利冲昏头脑的思想，当时也有一定的历史环境，因为在武汉、信阳一带，有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蒋、阎、冯新军阀的中原大战。中央红军在毛主席的领导

下，取得很大胜利。各地的红军和根据地也有了很大发展，全国红军有六、七万人。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也逐渐恢复，工会、农会有了恢复，党员也达六、七万人，较大的工厂都组织了赤色工会。农村也有了抗租抗税的斗争。在反动军队中也作了策反工作，发动士兵哗变的工作。所以李立三就认为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只要一点火就能够全国总爆发。这是对形势的估计。

另一个方面，李立三搞了一个全国总暴动的计划，就是用工人总暴动，武装起义，首先夺取上海、夺取南京、夺取武汉。李立三认为南京是蒋介石的头，把南京夺下来，也就是把蒋介石的头砍下来了，武汉、上海是蒋介石的心脏，把武汉和上海拿下来也就是把他的心脏拿下来了，全国革命就胜利了。他要求各根据地的红军攻打中心城市，要求打长沙，要求打南昌，要求打九江，然后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来取得全国革命胜利，引导世界革命总爆发。

第三方面，就是在组织上，把党、青年团、工会组织合并成为行动委员会，把党组织、团组织、工会组织都停了。中央有一个总行委，实际上是空的，具体在江南有一个行动委员会，管安徽、江苏、浙江，有华南行动委员会，有北方行动委员会，有武汉行动委员会。江南行动委员会由李立三当书记，李维汉当组织部长，陈云同志管外线工作。华南行动委员会派李富春同志负责。北方行动委员会派贺昌同志负责，后来牺牲了，还有关向应同志。武汉行委派任弼时同志负责，他当时是长江局书记。江南行委是中心，等于是中央行动委员会，李立三自己直接抓的。首先他们从上海发动，发动电车工人罢工，结果一部分工人罢起工来，一部分工人给黄色工会把持了，没有罢工。上海有个“和记蛋厂”，有一个比较大的党支部，发动和记蛋厂罢工，结果组织被破坏。另外发动上海郊区南通等几个

县的特委来组织武装起义，特委书记是刘瑞龙同志，又派了张爰萍同志，黄火青同志，他们是军事干部，来领导农民起义，当时人数很少，也失败了。安徽是李立三亲自来发动的，他跑到安庆，结果也没发动起来。南京当时我党只有一个支部，另外掌握国民党军队中很小的一部分力量，派全国总工会一个委员去发动暴动。李立三说南京暴动一定要胜利，夺取国民政府，就等于把蒋介石头砍下来了，这是个冒险，结果这个支部，还有差不多一个连的武装力量，我们党掌握的都很快被破坏了，受到很大损失。在苏区，彭德怀同志于七月下旬，打下了长沙。还要毛主席打南昌。毛主席知道不能这样硬攻，就把南昌周围的根据地扩大了，后来又让毛主席去打长沙，让鄂豫皖的四军，贺龙的二军打武汉，都是打武汉的外围，实际上，这样攻中心城市攻下来是不可能的。当时在白区首先起来反对立三路线的是恽代英同志，他是江苏省委的组织部长，因为反对立三路线被降职。立三在组织上实行打击政策，把他降为上海沪西区区委书记，并叫他上街撒传单。恽代英同志是高度的近视眼，带着传单在上海街上撒，前面是巡捕在那抄把子，机警的人一看巡捕在抄把子一转弯就跑了，他近视眼，看不清，结果一下把他捉到，抄出一把传单，他马上把脸抓破，说他是一个小学教员，同情共产党。人家叫他撒传单，这样更名换姓，敌人就没有认出恽代英来。恽代英是赫赫有名的，过去在黄埔的时候，蒋介石是非常重视的。他关在南京监狱中，判了几年刑，就要释放了。但是，后来一九三一年，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他也是工人出身，是个流氓，就象王洪文这样一个人，他叛变了，就向蒋介石告密，说南京监狱关着恽代英，他化名叫什么名字。后来蒋介石就派人跟恽代英说，只要恽代英帮蒋介石做事，那就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一切高官厚禄都有了，但被恽代英骂回来，后来恽代英同志在雨花台英勇牺